

<<治史三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治史三书>>

13位ISBN编号：9787538250596

10位ISBN编号：753825059X

出版时间：1998-3

出版时间：辽宁教育出版社

作者：严耕望

页数：304

字数：222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治史三书>>

内容概要

这本小册，只是我就所想得到的若干问题，随意漫谈，说不上史学方法论，充其量只能说是我上人的体验，个人方法而忆。

综合这九篇文章，扼要言之，不外下列几点。

原则上：从大处着眼，从小处入手，以具体问题为先着，从基本下下功夫；因守一定原则，不依傍，不斥拒，能容众说（包括各种理论与个别意见），随宜适应，只求实际合理，不持成规。

<<治史三书>>

作者简介

严耕望（1916 - 1996），号归田，安徽桐城人，著名历史学家。

1940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

曾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及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中国文化研究所、新亚研究所研究员、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中古（秦汉—唐）政治制度及历史地理，著有《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唐仆尚丞郎表》、《唐史研究从稿》、《唐代交通图考》等。

<<治史三书>>

书籍目录

本书说明治史经验谈序言一 原则性的基本方法 (一) 要“专精”，也要相当“博通” (二) 断代研究，不要把时间限制得太短促 (三) 集中心力与时间作“面”的研究，不要作孤立“点”的研究：建立自己研究重心，不要跟内抢进 (四) 要看书，不只要抱个题目去翻材料 (五) 看人人所能看得到的书，主人人所未说过的话 (六) 其他几点意见二 几条具体规律 (一) 尽量少说否定话 (二) 不要忽略反面证据 (三) 引用史料要将上下文看清楚，不要断章取义 (四) 尽可能引用原始或接近原始史料，少用后期改编过的史料 (五) 后期史料有反比早期史料为正确者，但须得另一更早期史料作证 (六) 转引史料必须检查原书 (七) 不要轻易改字三 论题选择 (一) 具体总是与抽象问题 (二) 问题的实用性 (三) 大问题与小问题 (四) 自己能力与材料情况 (五) 检查论著目录四 论著标准五 论文体式 (一) 常行体 (二) 纲目体 (三) 纲目变体 (四) 复合体六 引用材料与注释式 (一) 引用材料方式 (二) 注释方式七 论文撰写与改订八 努力途径与工作要诀 (一) 立志与计划 (二) 工作要诀九 生活、修养与治学这关系 (一) 健强身体、健康心理治史问答钱穆宾四先生与我附录 中国史学办的朴实楷模——敬悼严耕望学长 (余英时)

<<治史三书>>

章节摘录

书摘 各人研究学术的目标不同，此处只就史学工作者在学术方面的贡献而言。

杨联升兄是位学术批评家，好几年前曾称述一个史学工作者的成就，说“充实而有光辉”；又曾转述胡适之先生称赞同一个人的成绩说“精细而能见其大”。

我想这两句话的内涵不全相同，但意境实很相近。

这两句评语，某位史学工作者是否当之无愧，姑且不论；但我想借此两语作为史学论著的标准，却极为恰当。

联升兄的话本自《孟子》“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一语，原即寓有“大”义。

今就这两句话分析起来，“见其大”可谓为“光辉”的一面，而“精细”尤为“充实”的最基本条件；所以联升兄的话似乎可以涵盖胡先生的话，故今姑以“充实而有光辉”为主体作一说明。

这句话显然可分为两个层次，基本上要工作做得“充实”，但最高标准则要兼具“光辉”。

充实比较容易讲，最主要的是材料丰富，论断平允，踏踏实实，不发空论，这样的论著，才能算得上是内容充实的有价值的论著。

如有必要，须曲折辩论，达到论证的目标，但步步谨严，如做数学，无一步虚浮，这就比较更难，也更见作者功力，在充实的论著中又有其较高地位。

凡是内容充实的论著，不论其问题大小，主要在一“精”字，虽然是小问题，而做得很精审，仍然是内容充实的论著，有其颠扑不破的价值。

不过精审充实仍只是有价值论著的基本条件，不具备此种条件，根本不能跻入著作之林；至于欲其论著达到更高境界，则当在“充实”的基础上，再进一步，显示其有“光辉”。“光辉”比较难以具体说明，不过我们可以从两方面去认识：第一要有见解有识力，工作成果要显出有魄力，能见人所不能见，盲人所不能言，或言人所不敢言；而同时须兼顾最基本条件——精审充实。

这样的论著自可当“光辉”之誉。

而此种光辉境界，不一定在大论题上才能显现；若论题甚小，规模也很小，但工作精审，在精审之中能透出作者之有超人识力，此亦光辉之一面。

胡先生所谓“精细而能见其大”，在这些处尤能认识其意义。

或者在专精的充实工作进行中不能随时表现这一点，但充实的工作做完之后，也要能站在材料的坚强基础上，凌空笼照全局的说几句话，此亦为显现光辉面之一法。

第二要工作规模恢宏，组织严密，且有创获。

学术工作要规模恢宏，或组织严密，或有创获，都不难，但要兼而有之，财极不易；当然这里面还要包括一个基本条件——内容充实，这就更不易。

兼此四者，自亦可当“光辉”之誉。

总之“光辉”总偏向于恢宏与通识，但与通论不同。

写通论性论文，固当以恢宏通识为最基本条件，若不具备此一基本条件，就将毫无学术价值；但恢宏通识却不限于通论性文学，一部大规模的专门性论著，一篇短小精干的专门性论文，皆可透显作者是否有恢宏的意境，通豁的识力，以臻于“光辉”的境界。

要想在学术上有相当成就，第一必须有健康的身心——身体健康与心理健康。

记得在初中读书时代，实颇用功，尤不爱运动。

长兄德明有一次信上劝我注意身体。

他说身体如一只船，学问如同载量，船不坚固，甚至破坏了，如何还能运载！

此语给我的印象极为深刻。

最近看《明报》一篇短文，把身体比作成功的机器，意义也是一样。

机器性能不良，甚至破烂，如何能利用它制出优良的成品来！

要想身体健康，自必生活有节度，饮食、寒暖、运动、休息，皆当注意节度，此不待言。

而心理健康，亦同样重要，并且大有影响于身体健康。

心理健康是医学上的专门问题，不敢深论。

不过就我个人的体验，快乐的人生观，心情轻松，胸怀坦荡，是心理健康的基础，对于身心健康大有

<<治史三书>>

好处。

最近看报，说医学界对于健康提出了九个标准：第一，心里常觉有幸福感。

第二，对工作有热忱，办事有效率。

第三，笑口常开。

第四，有信心。

第五，有自我克制的能力。

第六，没有疾病和痛苦。

第七，不会杞人忧天。

第八，能勇敢地面对现实。

第九，不失眠。

这一大半与快乐的人生观有关。

我是个绝对的乐观派，对于自己，对于社会，对于国家民族、人类前途，永远觉得有办法，有希望，不悲观。

当然主见得遇事都真能乐观，但糊涂的乐观至少自己得到轻松快乐，岂不很好！

至于对事对人，我觉得宁滞毋敏，宁可迟钝一点，不要太敏感，多疑虑；纵然觉察到他人对已有不利迹象，也要有胸襟化解，不要放在心上。

有人要说太迟钝，岂不要吃亏。

其实吃点亏也不算什么，何必斤斤计较一日的得失！

何况这个社会，还是心术正常的人居多，不过有些人心地狭隘，有些人有自卑感，不能吃亏，务欲逞强而已，真正小人还是比较少数；只要能遇事装点糊涂，让人一步，也就相安无事。

十几年前我来香港，有位好朋友告诉我说，来到新地方，环境比较复杂，“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我很感谢这位朋友的忠告，但我自警是个不设防的城市，不会有人来攻；纵然有人来攻，也不在乎。

又有位朋友告诉我，像我也该有人忌妒了；盖有所闻而言。

我虽也有觉察，但只付之一笑，若无所知，绝不计较。

这不但是品德修养问题，也关乎心理健康。

我自信这些事对于我无大影响，不计较即无萦于怀，不影响自己情绪，不浪费心力时光，这对于身体健康与学术工作都大有关系。

我前面说过；有青年大文学家大科学家，但没有青年大史学家、史学有较大成就，总得在五十以后，至少近五十岁，最好能活七十八十，而且要身心健康。

自己不乐观，心情不轻松，对人对事斤斤计较放不开，身体自然不会很健康。

悲观，放不开，身体不健康的人，自然精神不济，无法有坚强的毅力达成他的远大志愿。

第一，近代史学风尚，偏向尖端发展，一方兰扩大新领域，一方面追求新境界。

这种时尚，重视仄而专的深入研究与提出新问题，发挥新意见，对于博通周赡但不够深密的学人就不免忽视。

诚之先生属于博赡一途，故不免为一般人所低估。

第二，近代史学研究，特别重视新史料——包括不常被人引用的旧史料。

史学工作者向这方面追求，务欲以新材料取胜，看的人也以是否用新材料作为衡量史学著作之一重要尺度。

而诚之先生的重要著作主要取材于正史，运用其他史料处甚少，更少新的史料。

这一点也是他的著作被低估的一个原因。

第三，争名于朝，争利于市。

诚之先生的时代，第一流大学多在北平，学术中心也在北平。

前辈史学家能享大名，声著海内者，亦莫不设教于北平诸著名大学。

诚以声气相求，四方具瞻，而学生素质也较高，毕业后散布四方，高据讲坛，为之宣扬，此亦诸大师声名盛播之一因。

<<治史三书>>

而诚之先生学术生涯之主要阶段，一直留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

上海不是学术中心，光华尤非一般学人所重视。

诚之先生是一个埋头枯守，默默耕耘，不求闻达的学人，我想这也是他的学术成就被忽视之又一原因。

因为在上列几项原因，所以他的声光遂不如二陈一钱三位先生之盛，但实际上他的成就并不在他们三位之下。

前文谈到，博通周瞻与精深有新解两途。

学术创获诚然须专精有新解，但博瞻仍是为学大道，且极不易，或许更难。

只就诚之先生四部断代史而言，每部书前半综述这时代的政治发展概况，后半部就社会、经济、政制、学术、宗教各方面分别论述。

前半有如旧体纪事本末，尚较易为功；后半虽类似正史诸志，而实不同。

除政制外，多无所凭藉，无所因袭，所列章节条目虽尚不无漏略，大体已很风匝赅备，皆采正史，拆解其材料，依照自己的组织系统加以凝聚组合，成为一部崭新的历史著作，也可说是一种新的撰史体裁。

其内容虽不能说周瞻密匝，已达到无懈无憾的境界；但以一人之力能如此面面俱到，而且征引繁富，扎扎实实，实不苟，章节编排，篇幅有度，无任性繁简之病。

更无虚浮矜夸之病。

此种成就，看似不难，其实极不易。

若只限于一个时代，自然尚有很多人能做得得到，但他上起先秦。

下迄明清，独力完成四部，宋以下两部亦已下过不少功夫。

此种魄力与坚毅，实在令人惊服。

我想前辈成名史学家中，除了诚之先生，恐怕都难做得得到。

这不是才学问题，而是才性问题。

问 你很推重冯承钧先生的翻译工作，可否稍详说明你对于翻译工作的意见？答 世界上国家民族众多，语言文化各不相同，欲增进各国人民的互相了解，最好的方法当然是能语文互通，以增进彼此的了解，渐期达到生活文化的沟通融和。

然而语言互通，只能期之于少数人；绝大部分人群不可能都做得得到，何况多样化的语言文字，要每个人都能通解，不但不可能，而且是一种浪费，有害于其他方面的高度发展。

就学术而言，除了自然科学大体上没有民族国家的传统特征之外，其他各种学科领域，各国家各民族总不免各有其独特的传统，也各有其思考述作的方式，而各种传统也各有所长，可以互相观摩。

就史学范畴而言，研究世界史固不必说，就是研究自己的历史，如能多懂些外国语文，多看人家的论著，也大有益处，这在前面谈治中国史是否要从中文下手时也已谈过。

不过精通一种外国语文，就以英国语文为例，真正能看英文书刊就很不容易，要花很大功夫。

一个人的精力时间都非常有限，要想研究中国史的人都能精通英国语文，虽不是不可能，但他在中国史上所用的功夫势必相对的大为减少，他的成就也就相对的降低。

何况英国语文之外，还有其他各种语文著述，也各有参考价值，若要每个人都精通这些语文，始能了解他们的东西，那就绝对不可能。

所以近百年来史学界，除了特号天才陈寅恪先生之外，就数不出第二个人来！

因此我认为研究中国史的人都能精通几国语文，观摩各国学人的方法与成绩，当然最好不过；但事实上不可能，只能求其次，提倡翻译工作，希望能出些大翻译家，来弥补本国学人不可能都精通各国语文的缺憾！

况且从历史上看起来，翻译工作对于文化的传播与吸收都极其重要，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中国中古时代印度佛教的东传。

在魏晋南北朝至唐代前期，当时固然有不少信徒，不远万里，跋涉山川，到西域、印度去直接学习，回国传扬；但历史事实证明，佛教传扬与吸受的最有效方式是高僧大德大规模的译经运动，然后中国学人才能慢慢消化融合而光大之为中国式的佛教，甚至孕育发展为宋明时代的儒家理学。

我们看，在东晋时代中国最有名的两位高僧道安与慧远，都极力提倡翻译工作。

<<治史三书>>

汤用彤先生说，道安虽不通梵文，但在长安七年，以主持译经为中心工作，兵乱都邑，伐鼓近郊，仍工作不辍，而江南译经之盛，惹远提倡之力居多；唐初玄奘更是以精通梵文佛法而大规模从事译经工作。

唯有经过这些大师的提倡与主持，把印度佛教重要经论都翻译过来，使不能通解梵文的人都能接触到佛学的理论糟义，然后才能使佛学在中国生根，对于中国文化发生极大影响。

近代中国也出现了少数大翻译家，如严复之于社会科学，林纾之于西洋小说，都尽了不多的介绍作用。

但自我记事以来，翻译工作似乎不大为人所重视，好多精通外国语文的学人都喜欢自己著书，而不想译书，甚至鄙视翻译为程度较低者的工作。

其实这是极大错误。

我觉得一个人的工作，主要的是向社会人群提出贡献，对于他人有些用处，不论著作或翻译都是二样。

外文好的学人，与其提出一部不成熟，不顶好的著作，绝不如翻译一部西方名著之有贡献。

信不但如此，翻译工作有时可能比著作更有影响力。

例如以玄奘的学问当然能著作论疏，但若只撰论疏，而不大规模地翻译，他对当时对后代的影响可能不会有那样大，自己在佛教史上的地位也没有那样高。

再如严复的翻译工作，对于清末民初的学术界发生极大影响影响想若果他只自己著述，不翻译西方名著，他的影响力也不会有那样大。

就是林纾，虽然因为他不懂西文，不免传译失真，也不免选择失当，但他的译品在近代文学史上仍居有相当地位，或许超过他的散文作品。

.....

<<治史三书>>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